

江蘇文史資料選輯

第 十 一 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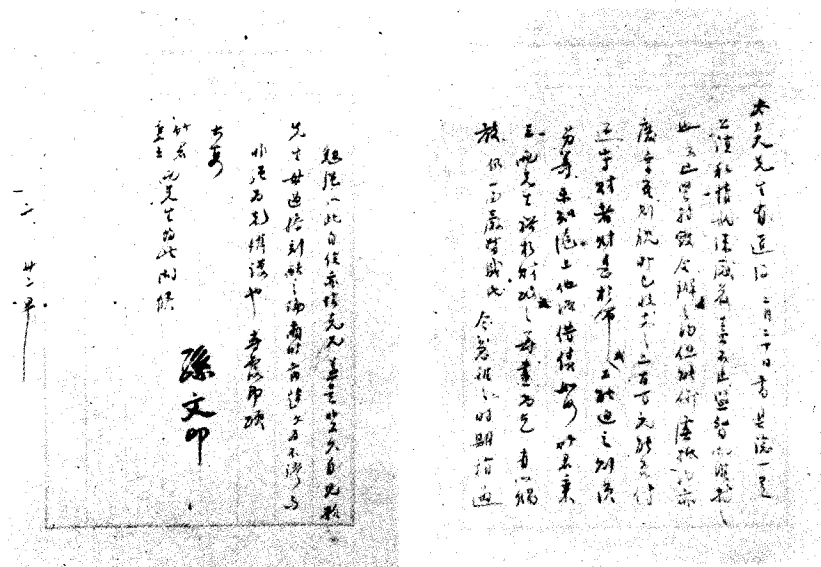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孙中山复章太炎的信。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日的南京《中央日報》。

汪院長昨晨被狙擊

中央極度震驚

各中委各地五全會代表紛往慰問
汪氏精神甚佳診治經過頗為順利
兇手孫鳳鳴當場為張繼所執



汪院長受傷倒地
蔣委員長伴隨醫院

中央已通告放假
出入證一概無效

各中委驅車探視
推蔣孔代表慰問

行政院通電全國
報告汪氏刺殺經過

各國領事之慶節
紛至外部致慰問

其除兇犯押警廳
各機關令長會審

刺汪兇犯

孫鳳鳴昨晨斃命

臨死時經各機關長官會同審訊
行刺動機與背景目前尚難推斷

國府令政法兩院嚴緝

刺汪有關人犯

汪康復期近背部縫線已脫去
醫士囑靜養昨僅延見蔣黃等

刺汪案昨日宣判

余張賀三犯處死刑

胡大海等分別處徒刑

胡昌牛張國屏徐瑞英無罪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日、八日和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日的南京《中央日報》。

目 录

孙中山复章太炎信 (1)

关于孙中山复章太炎信的说明和注释···章 导 (3)

回忆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我和高敬亭谈判

达成协议的经过刘刚夫 (8)

回忆徐州会议前后的冯玉祥李世军 (25)

日本南京总领事官邸中毒事件蔡德金 (31)

一九三五年刺汪案真相 (40)

华克之回忆南京晨光通讯社刺汪经过强剑衷 (43)

汪精卫被刺目击记彭革陈 (57)

我被作为刺汪案要犯逮捕、引渡、判刑的

前后经过情况余立奎 (62)

附载：刺汪案判决书内容 (75)

二十年代无锡见闻	陈枕白 (100)
三十年代的无锡丽新厂	无锡国棉三厂编史组 (109)
难产的上海安乐人造丝厂	邓仲和 (118)
附：关于邓仲和	蒋澧泉 (125)
我对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的回忆	李清悚 (127)
我国第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南通师范 ...	陆文蔚 (136)
抗战前的扬州中学	万彝香 (152)
唐文治和国学专修馆	陈其昌 (165)
瞿秋白学年考	贺忠贤 (178)

孙中山复章太炎信

太炎先生有道：得二月二十日书，具谕一是，公谊私情两深感荷，盖不止监督而维持之也。文已坚持毁合办之约，但能并虚抵约亦废弃否，则视所已收支之二百万元能否付还。守财者财甚于命，我不能迫之，则须另筹。未知沪上他路借债如何？竹君、秉三两先生裕于财政之筹划，尚乞有以赐教。（仍一面严督盛氏。）今急难之时期稍过，自当比择而从其宜。（大抵挖肉补疮，依然不免，但要视疮痛如何，肉可否挖耳。）

临时政府地点，鄙见亦与克兄同，谓军人本无执见，而克诳人以言，殊非事实，近者已为共见。而粤东争电，至今未已，其强横之辞，文已一概裁抑之。主南主北，各有理由。

公等所持，大都系永久之说，此自可俟将来国民会议之。至于革故取新，兼使袁君威令素行于北者，亦复收望于南，然后文得安然而退，从先生之教，为汗漫之游。否则南北之扞格依然，又有承受清帝统治全权之嫌，非所以善处也。文与克兄交处固久，先生亦素知其为人，此次执持过坚，然迥非出于私意，以先生之明，犹谓克欲谋总理，冤枉如此，谁与为辩。则不知清帝未宣布退位之前，季新、少川曾私约克仍掌陆军或参谋，而克拒之曰，奈何仍以是污我。文屡与言，亦期期不可，展堂等自爱其乡，欲求克归粤，一镇民军，亦不允。其厌事如此，乌有为总理之心事？更安有求总理而变乱大计？强无为有，如来书所云者。文于国事？只知有役务，不知有权位，故于进退之际，行其当然，不假勉强。以此自信，亦信克兄，盖是非不久自见。愿先生毋过操刻酷之论，尔时

当赍文为不谬，与非强为克辩护也。专复即颂
大安

孙文叩

竹君
秉三

两先生均此问候

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廿二日早

（本文系孙中山先生亲笔函，无标点，该文标点系编者所加。）

关于孙中山复章太炎信的说明和注释

章 导

一、说明

孙中山先生这一封信，是于民国元年(1912)2月22日早在南京所写，系答复章太炎先生于2月20日在上海给孙先生一封信的复函。在这一个时期内，为了临时政府的定都问题，以及“汉冶萍”公司与日本人的合办和借款问题，各方面议论颇多，章先生为了保护国家主权，曾先后四次上书孙先生，详陈利害关系，孙先生都作了答复，其中三封，已收入孙先生全集中，这一封信系我家所珍藏，近始发表。这封信中孙先生表示了对“汉冶萍”公司与日本人合办一事，坚决毁约；关于定都问题，表示了本身的观点，并对章先生与黄克强先生各自的主张作了劝解。

这一阶段的时代背景，系处于民国临时政府刚在南京成立。孙先生于1911年12月25日返国，12月29日被选为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告退位，在建国之初，军饷支出为数巨大，加之百事待举，需款更急，当时议院曾通过，拟举国债一万万元，但仓猝之中，零星征集，颇难应急，遂有议向“汉冶萍”公司商洽，拟由公司将“汉冶萍”押借款项，得款后，以国民名义，转借于政府，作为一万万元内债之一部分，而事实上“汉冶萍”之股东，有一部分即系盛宣怀及满清之奕劻、载洵、载涛等人，他们听到政府拟以“汉冶萍”为押品，向外人抵借巨款，深感不安，恐今后为政府所籍没，所以在盛宣怀逃往日本后，与日本人协商，将“汉冶萍”由中日合办，盛氏之举，实则具有抵制政府之意。章

先生鉴于与外人合股，难保无意外枝节，为保护国家之主权，遂上书孙先生陈述利害，请求废止盛宣怀与日本人松方正义合办之约，函中陈述为“……大冶之铁，萍乡之煤，为中国第一矿产，坐付他人，何以立国，公司虽由盛宣怀创办，而股本非出一人，地权犹在中国，纵使盛宣怀自行抵押，尚应出而禁制，况可扶同作事耶？……”。当时张謇任实业部总长，也向孙先生上书，坚决反对与日人合办，曾电孙先生“……汉冶萍事曾一再渎陈，未蒙采纳。在大总统自有为难，惟謇身任实业部长，事前不能参预，事后不能补救，实属尸位溺职，大负委任。民国成立，岂容有溺职之人滥竽国务，谨自劾辞职，本日即归乡里。……”此外各省亦有电政府，反对合办，孙先生听了众人的上言，权衡之下，认为应以国家主权为重，决定不批准合办之约，至1912年3月22日合约终，宣布作废。

关于“汉冶萍”与日人合办，《章太炎自定年谱》中曾有记载：民国元年（1912）四十五岁，……闻孙公以“汉冶萍”公司许日本松方正义合资，与盛宣怀同署名，时南通张謇季直被任为实业总长，予就问其事，季直言有之，吾亦不得不辞职矣，余递上书请速废约，孙公以军饷为辞，往复数四，卒得请而废约。……

孙先生信中所称“已收二百万元”一节，系“汉冶萍”公司与日人约定，在合办合约未批准之前，先借五百万元，转借给政府，当时已陆续借到交政府二百万元，所以孙先生表示，如合办不批准，此已收的二百万元，应予退还之意。

孙先生在就职临时大总统时，宣言曾提出内政方针：……“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以后为了祖国的统一，让位于袁世凯，因而袁氏当选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为了定都问题，各方意见不一，有人主张定都

北京，有人主张定都南京，章先生主张定都北京，章先生在《章太炎自定年谱》中，曾对此有所记载，……

二、注释

中华民国联合会

清帝退位，民国建立，各派群起组织政党，以期获得政权，此时秘密结社的“中国同盟会”，亦改组为公开政党，“同盟会”中的“光复会”一派，改组为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于1912年1月3日。

盛宣怀（1844～1916）

字杏荪，号愚斋，江苏武进人，秀才出身。1870年入李鸿章幕，历任轮船招商局会办，办电报局等，利用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垄断洋务企业。1896年接办湖北汉阳铁厂。1898年开办萍乡煤矿，至1908年合并汉阳制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成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名为商办，实权仍被其控制。1910年任邮传部尚书，1911年为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用“铁路国有”名义，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二路干线路权作抵押，大借外债，激起铁路风潮。武昌起义爆发，被撤职，逃亡日本，仍继续进行出卖汉冶萍的活动。

秉三 即熊希龄（1870～1937）

湖南凤凰人，字秉三，光绪进士，曾任清奉天盐运使等职，武昌起义后到上海，1912年参加由中华民国联合会组成的“统一党”，熊与张謇、章炳麟、程德全等任理事，1913年与梁启超、张謇等组阁，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次年去职。

竹君 即赵凤昌。

字竹君，一字惜阴，常州人。曾任曾国荃、林则徐、邓延楨及张之洞的幕僚。辛亥革命时期，与袁世凯、唐绍仪、张謇、程德全等立宪派联系密切，与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章炳麟等关系亦很密切。南北议和的秘密会议，常在他家中举行。

季新 即汪精卫 (1883~1944)

名兆铭,字季新,原籍浙江山阴(即今绍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曾任《民报》主编,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凯收买,参加组织国事共济会破坏革命,拥袁窃国。袁世凯失败,又投奔孙中山,1925年在广州任国民政府主席。1927年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后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国国民党副总裁。1938年12月离开重庆,公开投敌,做了大汉奸。1940年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任主席,1944年死于日本。

少川 即唐绍仪 (1860~1938)

广东中山人,字少川,一作绍怡。辛亥革命时期,代表袁世凯参加南北议和,1912年3月袁世凯任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唐任国务总理,6月辞职。

展堂 即胡汉民 (1879~1936)

广东番禺人,字展堂,1905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被推为广东都督,1913年被袁世凯免职。

粤东争电

2月21日临时政府第十八号公报刊载广州十四来电:“若中央仍主张前订条件,则请中央政府究竟所在地,组织中央政府之人物,及禁卫军安置之方法三者,明白宣布,始能释人疑虑。鄙意以为,若中央政府决在南京,则废帝而居北京亦可,……今中央政府主见及办法均未宣布,遂欲凭此条件议和,粤省决不承认。”

附白

在孙先生这一封信中,充分表现了他日夜萦怀的就是国家的统一富强,丝毫没有考虑个人的权势和享受,例如章先生的信,

在2月20日由上海寄发,孙先生在南京,于2月22日早即复信了,这说明了孙先生对处理公务的负责和迅速。又如信中所写,“……文于国事,只知有役务,不知有权位。……”从这几句话,充分表达了孙先生对建设一个共和国的热诚和革命的精神。

其次,孙先生为了达到大总统就职宣言中的“领土、军政、内治、财政、民族之统一”,毅然让位于袁世凯,以期达到祖国统一的希望,这种无私的革命精神,今天值得将此信公布出来,以供一贯声称奉行孙先生三民主义的台湾当局一读!

(苏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

回忆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 我和高敬亭谈判达成协议的经过

刘 刚 夫*

1934年，蒋介石派卫立煌率部镇压福建十九路军起义后，先后调任浙赣闽皖四省边区及豫鄂皖三省边区总指挥。1936年双十二事变，又调卫任第五路军总指挥，率部进驻潼关、临潼一带，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卫于1937年春回任豫鄂皖三省边区督办，设督办办公署于安徽六安。当时红军游击部队由红28军高敬亭率领。国共第二次合作，豫鄂皖三省边区和谈，卫立煌和高敬亭是国共双方和谈的当事主脑人物。

一、高敬亭部纵横驰骋于三省边界

在和谈前，卫对边区红军游击部队采取步步为营的碉堡围剿政策，将军队分作堵击、追击两部分，指挥着十一路军的两个师一个旅、十四军的两个师、贵军的两个师暨王修身一个师等，正规军约十个师两个旅，此外三省的保安团队和各县民团等尚不在内。

* 刘刚夫保定军校出身，当时为卫立煌部高级参谋。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安徽省保安团队干训班少将教育长、长淮水上警察局长、永荣师管区副司令等职。1946年3月起任新疆阿克苏区行政督察专员，10月辞职，离开军政界。卒于1971年，享年74岁。

这支围剿部队转战经年，士气沮丧，队伍虽众，师劳无功。

28军红军游击部队纵横驰骋于河南省光山、潢川、固始、商城、经扶，鄂东的礼山、黄安、黄陂、麻城、罗田、英山，安徽的岳西、太湖、潜山、桐城、舒城等各县的边境。卫立煌通令各县悬赏缉拿高敬亭。如能捕获者，赏洋十万元，官阶照升。又说如果携械投诚，分别给以奖赏，终无所获。在大军围剿、烧山迁民、封锁物资的情况下，游击部队神机妙算地进行反围剿的斗争。他们的斗争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时佯攻追击部队，引至堵击部队阵地，使堵击和追击两部自行接火，然后抽身退出火线，这样，使国民党军队自相残杀，混战终宵；有时故意暴露目标，让国民党部队演捉迷藏式的庸人自扰；有时黑夜吸引国民党军队兜一个大圈子，动辄数十里，仍追返原地。总之，红军以极少数人的小队，牵拉着国民党队伍一步一趋地跟踪追击，东南西北，任意调遣。采取这种调虎离山的方式，从而使得游击队的转动真是神乎其神，而国民党的军队则疲于奔命。

二、参加和谈前我的思想情况

七七抗战开始，正是吾辈军人效命祖国之时，全国人民竞起抗日，救亡图存。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颇失人心，亦触动我久蓄于心的旧恨新怨。如蒋介石上台以来不让我们保定毕业军人带兵，难道叫我们一辈子作参谋人员吗？学军事的人不让其带兵，就等于让它拿着筷子，却不让它挟东西，现在要抗日，不啻无形中剥夺我们直接为国杀敌雪耻的权利。我是安徽人，我算一算，安徽省主席一职，除吴忠信曾担任过短时期外，就再无第二个皖人了。如果我们任外来者宰割压榨，当军人的就对不起家乡。卫立

煌不是黄埔系，又不是浙江籍，更是杂牌队伍改编的，对蒋虽曾卖过不少力，但忠而见疑，直而遭忌，在抗战前即使想做一个省主席，也求之而不可得。卫对蒋每有所建树后，随之而来的总是反而被削去实力，非迫不得已不再给以重握兵权。吾辈跟随卫立煌的人，颇为不平。基于上述诸种想法，卫立煌、郭寄峤和我常感有建立自己部队的必要，但势不可能。因此在高敬亭提议和谈之初，我的看法与卫雷同——认为高敬亭是独树一帜，不属中共中央统率，可以乘机收编为卫之队伍，所以和谈一开始就全力促其达成协议。旨在抗日固属一面，私衷是其另一面，这种幻想后为现实所打消。

三、权充和谈代表

三十二师师长王修身电告：“据岳西县方县长转据该县第三区李区长报告，红军高敬亭派人来致意愿开和谈，但必须卫督办派代表来。”时卫立煌在庐山（是开会抑受训，已记不清），当由参谋长郭寄峤和我召集刘晓武等少数同学从事研究。有的说，高敬亭被我们清剿，重重包围，力穷势急，这提议是缓兵之计，让他先喘一口气，重整旗鼓，再来扰乱。有的说，游击队好杀人、放火，不能听他的花言巧语，我们派代表去，是羊入虎口，有去无还，不能堕其术中，还是加紧围剿。有的说，高敬亭势穷力竭，我们如果派去代表，他也不必杀害，尽可带在身边保险，紧急关头，我们投鼠忌器，他好脱身逃窜，试问哪个敢去？还有人说，果真要和谈，他派代表来好了，何必一定要我们派代表去呢？诡计多端，细细探听一下再说。郭寄峤眼看大家一味偏见，就问我：“你的看法以为如何？”我说，缓兵之计，可能性是有的，但我们去后，多

少会看到游击区里一点真情实况，对我们布置清剿倒是有益。他们不会这样傻，这是第一点。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如果请我们派代表去而杀之，那就不是缓兵之计，而是促使我们加紧围剿了。他们不会这样傻，这是第二点。现在被层层包围，范围越来越小，人数越来越少，尤其几次烧山，连树皮草根都找不到，身陷重围，吃喝没有，即使松口气，有什么旗鼓可重整呢？这是第三点。自发生西安事变，共产党出来调解，老蒋安然返都，全国百姓对共产党的看法比前有所不同。现在国共和谈的风声，甚嚣尘上，高敬亭提出和谈，不是无因的。在我看没有什么诡计。请问骗我们牺牲一、两个代表，于他的好处又在哪里呢？这是第四点。日本鬼子现在一步紧一步地要并吞全中国，我们家里自己打自己要紧，还是打日本鬼子要紧呢？保卫祖国是我们军人的天职，高敬亭现提出和谈，不管和得成和不成，我们照派代表去不会错。凡是中国人谁不愿打日本鬼子，能够大家合起来打日本，中国还有救的希望，否则，不是说丧气的话，亡国就迫在眉睫了。有人立起来说：“还是刘高参讲的确有见地，先前只为我们自己打算，没有把国家民族考虑进去。可是现在派哪一位去好呢？”

我见大家面面相觑，高调是我发的，如也畏缩不前，岂不笑话。况一切外交事宜，老卫原来就交我负责的，在这种情况下，只好说：“无人去，我去！”

郭说：“不忙，先将高敬亭的提议和我们讨论同意派代表去的结论，电报庐山老卫，看他派谁去。”

卫即回电，派我为全权代表。并令郭寄峤代拟通令边区各专员、县长和各分区司令尽量给我以便宜行事，负责保障我的安全。

起初，我对单身独骑深入游击区，信心亦是不够。但激于公愤私情，亟欲促成豫鄂皖边区停战和谈实现，可以抽出这支兵力，